

嚴師出高徒



文化 經濟

月前，內地媒體報導：樂黛雲等九位「在比較文學領域作出過卓越貢獻」的專家學者，被授予「中國比較文學終身成就獎」。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嚴紹璽赫然其中。

一九四〇年出生的上海人嚴紹璽，十九歲那年以優異的高考成績進入北大中文系，從此不離不棄，一轉眼，便五十餘載矣。嚴公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令人咋舌的成就，離不開四位老師的諄諄教誨與嚴格要求。這四位老師乃魏建功、楊晦、陰法魯、周一良是也。

一九五九年秋季開學之初，中文系辦公室排課表一不小心，將大一學生嚴紹璽與大三學生排在一起上「大學英語」課，結果讓他用半年時間修完了本應學兩年半的英文，且考試成績可觀。時任專業主任的魏建功老師知道了，不無嚴肅地對他說：真難為你，但就不能就此滿足，你還得再去學一門日文。日本人接受中國文化，搞了我們很多東西，卻不知道他們都做了些什麼，你把日文學好，將來就有可能搞個一清二楚。在魏老師的鼓勵下，嚴紹璽學會了日語。

一九七一年夏，嚴紹璽從江西五七幹校返回北大，面對冷清清的校園，他坐在未名湖畔發呆。這時，頭上還頂著「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兩頂帽子的系主任楊晦老師突然出現在他面前，悄悄地問他：你的兩門外文丟了沒有？湯答曰：都還馬馬虎虎。這次去江西一年半，隨身帶了日文版的《毛主席語錄》和《毛澤東文選》，有空就讀一讀。楊聽後，一本正經地對他說：光英文、日文還不夠，有時間還得學點德文什麼的，外文這東西，別看現在沒用，將來一定會派上大用場！楊先生的高瞻遠矚深深地打動了嚴紹璽的心，從此他對學習外語更加充滿了信心。

一九七四年冬，在周總理的關注下，北大組成「社會科學訪日團」訪問了日本十四所大學，嚴紹璽為成員之一。回來後，他向系裡的師生講訪日感受，提到中國禪宗中的黃檗宗也傳到了日本。講話中他將黃檗宗中的「槩」字念成了「pi」。第二天，對敦煌音樂史素有研究的陰法魯老師柔中有剛地跟他說：昨天你念錯了一個字，黃檗宗的「槩」字不能讀「pi」，應該讀「bo」。如有一種樹，就叫黃檗樹(huangboshu)。作為古文獻專業的教師，是不應該念錯這個字的啊！中國字多，但只要一個字一個字地把握它的發聲，不「望形生音」，不「望文生義」，慢慢積累，便能豐富自己。嚴紹璽聽了之後，非常感動。

一九八八年，嚴紹璽公開出版了《中日古代文學關係史稿》一書，學界評價相當高，有人即此鼓勵他爭取破格申報教授。孰料，周一良老師提出了反對意見。周老師說：「紹璽這本書，確實非常好，但他『對文言『其』字的用法把握不當。譬如說，他引用某書的時候，就寫道『其曰』什麼，其實應該是『其文曰』什麼」，五十萬字的書中「其曰」就有九處之多，「一個中文系的教授，如果不能掌握這個字的基本意義，是不合適的」。嚴紹璽在震驚後反思，覺得自己「應該服氣，周先生從『一字』抓起，擊中命脈」。從那以後，他做學問便格外謹慎了。

魏、楊、陰、周四位老師對嚴紹璽的教誨，從表層意義上分析，無非是學好外語和多學幾門外語，以及讀準一個字和用對一個字。但從深層意義上來解讀，就遠不止這些了。魏、楊二師的鼓勵點撥，毋庸置疑，是他們要求嚴紹璽做學問一定要心胸開闊，放眼世界，不能拘囿於一域一時。陰、周二師的逼仄嚴苛，顯而易見，是他們鞭策嚴紹璽做學問務必精益求精，天衣無縫，不能急功好利，主觀臆斷。正是老師們的這番良苦用心，兼以自身的心領神會，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打拚，嚴紹璽終於由一名翩翩少年歷練成了一位享譽海內外的著名教授和學者，這實在是「嚴師出高徒」的經典印證啊！

《鄭風》與「鄭聲」

楊舟



文化 什錦

魯迅《漢文學史綱要》第二篇《〈書〉與〈詩〉》云：「激楚之言，奔放之詞，《風》《雅》中亦常有，而孔子則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後儒因孔子告顏淵為邦曰「放鄭聲」，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遂亦疑及《鄭風》，以為淫逸，失其旨矣。自心不淨，則外物隨之……數年前我為魯迅此書作講評，只是註出了有關引文的出處，而未及生發開去（詳見顧農講評本《漢文學史綱要》，鳳凰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第十六頁）。

按魯迅區分《鄭風》與「鄭聲」，是注意區分詩歌的文本與音樂，也就是歌詞和歌譜。《鄭風》在詩三百篇中，應當亦屬「思無邪」，而「鄭聲」則因亂雅樂而放逐之，這是兩回事，不宜混為一談。可惜混為一談之後儒甚多，清人戴震駁斥這種看法道：「凡所謂『聲』，所謂『詩』，非言其詩也。如靡靡之樂，滌盪之音，其始作也，實自鄭、衛、桑間、濮上耳。然則鄭、衛之音非鄭、衛詩，桑間、濮上之音非《桑中》詩，其義甚明」（《東原集》卷一《書鄭風後》）。汪士鐸說：「詩自為詩，詞也；聲自為聲，歌之調也，非詩也」，「聆其聲，不問其詞，其感人如此，非其詞之過也」（《汪梅村先生集》卷五《記聲詞》）。他們都堅持聲、詩之分，為魯迅的立論導夫失路。要之，「放鄭聲」乃是一個音樂問題，而非文學問題，其間雖有聯繫，但到底是兩回事。

《字貫》案與避諱學

顧農



文史 叢譚

新編一部字典，把幾代皇帝的名字寫在書裡，現在看去都沒有什麼問題；但在當時卻已罪不容誅。《康熙字典》是欽定的，絕對不容批評；本朝皇帝不管是已經去世的還是今上，其名字應當避諱，直接提到就是大逆不道。糊裡糊塗的舉人王錫候兩罪並罰，非監獄搬家不可了。避諱是專制時代的傳統，凡臣民對君主不能直呼其名，也不能把那些字直接寫下來，須採取種種迴避的措施，代之以同義字或音相近的字（如康熙名玄燁，代之以元煜），又有特意少寫一筆的，這「敬缺末筆」的怪字並非錯字而是避諱字。群衆對聖人（孔孟），兒子對父親，甚至下級官員對上級的名諱也都要注意避忌，以表示尊重。舊時代稱這些麻煩為「國諱」、「聖人諱」、「家諱」和「憲諱」。而在這避諱之中又有種種花樣，什麼「不避嫌名」、「二名不偏諱」、「已祧不諱」、「臨文不諱」等等，無非是要盡量減少因避諱而產生的麻煩，又要講究避諱，又要想法簡化，總之是沒事瞎折腾。維護皇帝的權威，也要落實在這裡。

清代文字獄的案情和處理辦法，有若干現在看去顯得奇怪，很不容易理解。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發生了影響深遠的王錫候《字貫》案。此前江西新昌縣舉人王錫候編撰了《字貫》一書，其序言中提到，《康熙字典》固然非常了不起，但也有收字太多、使用不便等問題，所以提供自己的新成果云云；江西巡撫海成接到以後認爲其心膽大包天，簡直與叛逆無異，應予懲辦，革去舉人頭銜。他將此事上奏朝廷，以表明自己的政績；不料乾隆皇帝看到以後卻大爲發火，迅即下了一道《將王錫候迅速解京嚴審治罪諭》，諭旨嚴厲地指出：「朕初聞以《字貫》爲書，其書立說，自有應得之罪，已批大學士、九卿議奏矣。及閱其進到之書第一本序文後，竟有一篇將聖祖、世宗廟諱及朕御名字悉行開列，深堪髮指，以申國法而快人心；罪不容誅，即應照大逆律問擬，以申國法而快人心；乃海成僅請革去舉人審擬，是何言耶！……至王錫候身良盡昧，負朕委任之恩，著傳旨嚴行申飭。到王錫候身爲舉人，乃敢狂悖若此……不可因此徹底嚴查，一併明正其罪。」（《清代文字獄檔（增訂本）》，上海書店出版社二〇一一年版，第六六二頁）在乾隆皇帝看來，王錫候竟敢批評《康熙字典》，大逆不道，而他在該書的《凡例》之後，將康熙、雍正和乾隆本人的名諱悉行開列，乃是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單憑這一條就應定爲死罪。海成連這麼大的問題都看不出來，亦應嚴懲不貸。稍後，海成被革去江西巡撫，交刑部治罪，判斬監候（死緩）。海成的頂頭上司、兩江總督高晉應承擔領導失察之責，給予降級處分。王錫候處以死刑，立即執行斬決；其子孫皆判斬監候。

鄭延國

高山王國的中國情

陳來元



位處非洲南部的萊索托是一個風景秀麗的高山王國（資料圖片）

位處非洲南部的萊索托是一個風景秀麗的高山王國，素有空中花園之稱。一九九七年至二〇〇〇年，我擔任中國駐萊索托大使。任期中，中萊兩國在政治、經貿、技術、文教、醫療衛生、新聞等各個領域的友好合作關係得到全面、快速發展，兩國人民的傳統友誼不斷加深。在不斷推動兩國關係發展的過程中，我與萊索托高層領導的交往很多，工作關係和個人之間的關係都非常融洽，這使我切身體會到，這個高山王國的高層領導人有着很深的中國情結。

萊索托王國是當今世界上爲數不多的君主立憲國之一，國王爲國家元首。中國與萊索托於一九八三年建交以來，萊索托王室一貫堅持一個中國立場，對中國一向懷有友好情誼，並爲兩國友好合作關係的健康發展不斷做出新的努力和積極貢獻。萊索托現任國王萊齊耶三世的故父王莫舒舒國王於一九八五年九月訪華，母后瑪莫哈托皇太后於一九八七年九月以王后身份訪華。一九八八年，其弟賽伊索親王也到中國訪問和進修。萊齊耶國王早有訪華願望，但因種種原因，直到我於一九九七年底赴萊履新時還沒有成行。然而，他爲實現訪華一直在不斷努力。

一九九八年二月十二日，我向萊齊耶國王遞交了國書。他接受我的國書後，將我留下單獨交談。其主要話題之一便是向我表達其強烈的訪華願望。他說，他一直想訪華，王室成員中除了他本人之外，都去過中國，只有他未去。每當一家人在一起談及中國，他母親、弟弟談起他們的訪華觀感時，他在一旁卻插不上話，心中很不是滋味，這時他的訪華願望便更加強烈。因此，他希望我積極推動，促成他早日實現訪華。

在雙方的共同努力下，國王的訪華時間被安排在



域外 漫筆

王室成員嚮往中國

一九九八年九月，我隨同王后瑪莫哈托皇太后於一九八七年九月以王后身份訪華。一九八八年，其弟賽伊索親王也到中國訪問和進修。萊齊耶國王早有訪華願望，但因種種原因，直到我於一九九七年底赴萊履新時還沒有成行。然而，他爲實現訪華一直在不斷努力。

一九九八年九月，我隨同王后瑪莫哈托皇太后於一九八七年九月以王后身份訪華。一九八八年，其弟賽伊索親王也到中國訪問和進修。萊齊耶國王早有訪華願望，但因種種原因，直到我於一九九七年底赴萊履新時還沒有成行。然而，他爲實現訪華一直在不斷努力。

在雙方的共同努力下，國王的訪華時間被安排在

國王以朋友身份到我家中做客

我早想宴請國王，但按這個高山王國的禮賓規定，國王和首相均不能到任何外國使館或外交使節家中赴宴。這樣，請國王的事就不太好辦了。於是，我向皇太后請教，看有沒有辦法能幫我請到國王。皇太后面授機宜說，按萊索托禮賓規定，國王確實不能出席外國大使的宴請，但如果你不以大使身份而以個人名義請他這個朋友，而不是請國王，那他到你家做客就沒有什麼問題了。我茅塞頓開，按皇太后說的辦法去做，果然一舉成功，國王同意以朋友名義穿便裝到我這個中國朋友家中做客，並說將攜帶母親、未婚妻和胞弟一同赴宴。後來賽伊索親王因突然臨時有事未能赴宴，這是後話。

國王出席外國駐萊索托外交使節的宴會很不容易，這次卻接受變通辦法，同意到我家中做客，說明他不但視我爲大使，而且已把我當作他的好朋友看待了。此外，國王將準王后莫楚能小姐帶來赴宴，此舉又非同尋常。這是國王把我視爲他的好朋友而不當外人的又一證明。還有一件事更讓我出乎意外。席間，皇太后向我透露了一條重要消息，即國王與莫楚能小姐已定於二〇〇〇年二月十八日舉行婚慶大典。這一決定當時只有王室和政府高層知道，尚未宣布，外界無人知曉，而皇太后卻把我當作自己人，將這樣重要的國事、家事、喜事第一個告訴了我這個外國朋友，讓我一起分享他們的幸福和快樂。我若是記者，一定會將這一重大新聞搶個頭版頭條立即報道出去。但我是外交官，只能做一外交官應該做的事，同時感謝王室對我的這份信任和友情。宴會結束前，國王、皇太后和莫楚能小姐又興致勃勃地與大使館全體人員一起合影，留下了這值得紀念的美好時刻和歡樂情景。

王室爲我這個朋友饒行

二〇〇〇年五月九日，我接到外交部調我到納米比亞任職的指示。於是，我開始了忙碌的辭行拜會活動，其中包括由萊索托外交部禮賓司安排去王宮向國王萊齊耶三世陛下辭行以及去國王家鄉向瑪莫哈托皇太后陛下辭行。就外交禮儀而言，我告別拜會完國王和皇太后以後，我在萊索托任職期間與王室的交往就算結束了。然而王室卻認爲，他們與中國大使的正式、官方交往是結束了，但與我這個好朋友的交往還沒有結束，因此決定在國王行宮專門舉行一次家庭式午宴爲我送行。

赴宴那天，我準時到達國王行宮。這幢與皇太后的別墅同在一個大院內的建築物十分幽雅、別致，是專爲國王新婚建造的。我走進客廳，一眼便在十分顯眼的地方看見了我送給國王的結婚禮品——四扇一組的人物畫雙面繡屏風。這說明國王和王后對這件中國藝術品是多麼喜愛。包括國王、王后、皇太后和賽伊索親王在內的全體王室成員都出席了宴會。國王和王后對我前來做客表示歡迎，爲有我這樣的中國朋友而感到高興，祝願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不斷發展。皇太后告訴我，我是第一位被邀請到她大兒子（即國王）的新家做客的外國朋友；宴席上飯菜主要是她兒媳婦（王后）親自下廚做的，因此我也是品嘗她兒媳婦烹飪手藝的第一位外國客人。皇太后還對我說：「今天是一個家庭式的聚會，我的小兒子（即賽伊索親王）負責當招待端盤子、倒酒水。」我感謝王室的盛情款待，誇獎王后做的飯菜美味可口，讚揚賽伊索親王工作勤奮，稱讚王室對本人和中國人民的友好情誼，祝願兩國人民世代友好。我們頻頻舉杯，暢談友情，相互祝福，依依惜別。萊索托王室在接受一位外國使節正式辭行拜會後，還要再舉行一次王室全體成員參加的家宴爲其送行，而且是王后當廚師，親王當招待員，這是沒有先例的，也是十分難得的。而我不但得到了這份殊榮，還成了到國王新建行宮做客的第一個外國朋友和品嘗王后親手製作菜餚的第一個外國客人。對萊索托王室向我、向中國人民表達出來的如此深厚的友好情誼，我將終身銘記。（上）

此外，她還說已故國王一生只要了她一位王后，沒有王妃，她爲此而感到自豪。從她對我的這些談話中不難看出，她沒有把我當外人，國事、家事都願意對我說。

我也邀請皇太后到我家中做客，並由她自定其身邊的工作人員或好友隨行作陪。皇太后欣然接受邀請。席間歡聲笑語，暢敘友情，自不必說。我發現她愛吃中國餃子、春卷，此後每隔一段時間就讓廚師包點餃子、春卷給她送去。她還喜愛中國的綠茶和小工藝品，我也不時給她送一點。有時她農場的水泵壞了，我便派在萊索托搞援建的中國公司的專家去幫她修理。皇太后也常常讓僕人將她農場裏的肥豬宰上一頭，給使館送來。這樣你來我往，相互間的友情不斷加深。

真相沒有那麼簡單

古林



燈下集

「許多英國人和美國人來到巴黎時發現我們沒有他們想像的那樣消瘦，無不感到驚訝。他們見到婦女穿著優雅的連衣裙，似乎還是新的，男子上衣也還不失氣派；他們難得看見通常表明營養不良的蒼白臉色和生機萎縮。對旁人的關懷一旦失望，便會變成怨恨；因爲我們不完全符合他們事先設想的悲慘形象，我擔心他們會生我們的氣。可能他們中間已經有人暗自思量，法國是否應把戰敗看作一場好運氣，因爲戰敗當初使它置身事外，日後又使它不必付出巨大的犧牲作代價就重新取得強國的地位；可能他們和《每日快報》一樣認爲，比起英國人，法國人在這四年裡過得不算太壞。」

當有人一詢問我當戰俘的生活，我怎樣才能使沒有在俘虜營裡生活的人體會那裡的氣氛呢？只要加重筆觸，就能描畫出一團漆黑，而稍加修飾就能使一切顯得歡笑、快樂。甚至人們所謂的「一般情況」也不代表真相。

但薩特還是努力以平緩的語氣、客觀的筆觸再現「失血的首都」巴黎，在介乎戰爭與和平之間的佔領下的艱難困境：「當然我們沒有忘記我們的敵意和仇恨；但是這些感情已經變得有點抽象，久而久之我們在巴黎和這些實際上與法國士兵很像的印象之間建立起某種可憐的、很難理解的關係。一種不帶任何同情心的相互依存關係。確切說是生理上適應後形成的相互依存。最初我們只要見到他們便有一種建制的抽象性質。」這種抽象的，不能落實到任何人身上的恐怖可能是最難忍受的。「一方面，是我找不到對象和仇恨，另一方面是一個太熟悉，叫人恨不起來的敵人，而這兩者必須朝夕共處。」它對我們既是不能忍受的，同時我們又與它相處得不錯。巴黎人在這種兩難的、曖昧中生活了四年，像極了「喪失自我意識」的病人。「從戰爭開始到結束，我們無法要求對自己行爲的後果負責，病無所不在，任何選擇都是壞的，然而又必須選擇，並且對之負責，我們的心臟每一次跳動都加重了我們的罪惡感，我們爲之毛骨悚然。」而無論哪種選擇，我們對自己都是不滿的。薩特記錄了其中的一幕：「聖日耳曼大街上，有一次一輛軍車翻倒在地，把一名德軍上校壓在車下，我看到十個法國人趕上去把他救出。我確信他們都恨他恨得發狂；兩年後，他們中必定有幾個人成爲法國抵抗力量成員，在同一條大街上向佔領者開火。不過當時又是怎麼回事呢？敵人的概念只有當敵人和他們之間隔開一條火線時才是堅定的、明確的。」

最後，哲學家薩特執意要說出的是他的結論，「真相沒有那麼簡單」。在佔領這一曖昧的處境中，失血的巴黎露出了它的多重性格，仇恨、反抗同軟弱、膽怯共存一體，但最終巴黎有權值得尊重，包括它的過失在內。